

成都会议若干史实考释

张成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围绕成都会议的召开时间、会议性质、与会人员、会议文件等核心史实,学界尚存争议。经系统考证,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成都会议于3月9日至26日召开,会期18天;二是成都会议属于中央工作会议范畴,并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是参会人员包括正式代表、列席代表,共39人,而非此前研究中提及的34人或35人;四是会议通过的文件数量为44个,而非30多个或40多个这一模糊表述。针对成都会议的若干史实进行严谨考释与辨析,既有助于夯实党史叙事的史实根基,实现正本清源,也为理解该历史时期中央决策的运转机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视角。

【关键词】成都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 考释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25)04-0128-09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5.04.009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史称“成都会议”。目前,学界对成都会议的主题及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然而,对成都会议的召开时间、会议性质、与会人员、会议文件的基本史实,尚存若干值得商榷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对成都会议的核心史实展开考证,以求进一步廓清史实。通过对争议史实的澄清,可有效纠正片面解读与错误认知,还原历史本真。

一、成都会议的召开时间

关于成都会议召开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3月6日至26日说。中共四川省委

党史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与四川》写道:“3月6日至26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1]³³³二是3月8日至26日说。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认为,“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会议^[2]¹²⁹。三是3月9日至26日说。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增订版)》第三卷认为,“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会议^[3]¹⁰³⁰。

那么,上述三种说法之中,何者更为符合历史事实?关于成都会议的闭幕日期,因其清晰可考,故无争议。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与考辨,认为该会议的召开时间为3月9日至26日。主要依据如下:

【收稿日期】2025-02-13

【作者简介】张成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中共党史党建资助计划资助(DF2023ZD04)。

其一，3月6日成都会议开幕的说法不成立。在《毛泽东与四川》中，除提到3月6日开幕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3月6日趁下午休会，毛泽东参观成都武侯祠及杜甫草堂。”^{[1] 333}查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3月6日的记载，仅有一条，即“3月6日下午，游览成都武侯祠。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4] 309}3月7日，毛泽东赴杜甫草堂游览^{[4] 309}。这说明毛泽东的行踪不支持3月6日会议已经开幕。此外，3月6日，周恩来同李先念、李富春等人召开了三峡现场会议^{[5] 128}，邓小平在北京主持讨论了西南铁路建设问题（陈云参加了这一会议）^{[6] 86}。如若3月6日会议已经开幕，上述中央领导人的行程不会如此分散。因此，《毛泽东与四川》关于6日开幕的说法是一条孤证，故这一说法不成立。

其二，3月8日成都会议开幕的说法也不成立，应为9日开幕。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十分接近，容易混淆。从年谱传记史料来看，明确提出3月8日开幕的有《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等。与此相反，明确提出3月9日开幕的有《毛泽东年谱》第六卷、《邓小平年谱》第三卷等。这些史料存在分歧，不能凭借单一史料断言成都会议准确的开幕日期。首先，无论是3月8日中央领导人的行程安排，还是四川省、成都市当日的工作动态，均无法为“成都会议于3月8日开幕”这一说法提供史料支撑。《毛泽东年谱》第六卷没有提供3月8日开幕的直接证据^{[4] 309-310}。同时，再来看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行踪。8日，刘少奇下午及晚上在毛泽东处谈话，周恩来晚上在毛泽东处谈话，邓小平当天“上午，和陈云乘飞机到成都”，下午及晚上均在毛泽东处谈话（陈云晚上同在）^{[6] 87}。因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行踪也无法证明8日会议已经开幕。除中央领导人的相关行踪外，亦应关注四川省及成都市在3月8日的具体动态。由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第二卷同时出现了该会议于8

日、9日开幕的说法^{[7] 246, 242}。这是十分矛盾的表述。关于8日开幕，该书提供了更多细节佐证：“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在成都体育场召开有工业、手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部门职工7万余人参加的”^{[7] 246}誓师大会。《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也提到了8日召开的这场誓师大会。然而，此点尚不足以佐证誓师大会召开之际，成都会议亦同步开幕这一论断。加之，《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提到“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许梦侠”参加了这场誓师大会^{[8] 155}。若3月8日成都会议已然开幕，则四川省主要领导通常需要出席会议或为会议召开提供服务保障。而李井泉等人参加誓师大会这一史实，恰好可佐证3月8日当天成都会议尚未开幕。其次，就成都会议于3月9日开幕的直接证据展开考察。《毛泽东年谱》第六卷记载，“3月9日下午，成都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二十几个问题。”^{[4] 310}作为2023年经修订后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其在史料的遴选及运用层面具备相当的权威性。此外，曾亲身参与成都会议的与会者所留下的回忆性材料，亦从亲历者视角出发，进一步印证了成都会议于3月9日拉开帷幕这一史实。吴冷西在回忆中明确提到：“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9] 60}李锐也在回忆中提到：“成都会议于3月9日开始，26日结束，比南宁会议多开了7天。”^{[10] 174}这些回忆材料与新版《毛泽东年谱》等文献相互呼应，共同夯实了“成都会议于3月9日开幕”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前述论著之所以出现成都会议3月8日或9日开幕的表述分歧，一方面源于对会议议程中预备会议与非正式讨论的性质界定存在认知差异，另一方面则因相关论著未对会议开幕时间展开细致考辨。这种史实考证的疏漏导致成都会议召开时间出现争议。

综上可以确定，成都会议于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会期18天。

二、成都会议的与会人员

成都会议是195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之一，该系列会议涵盖1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以及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在党史会议研究的学术范式中，对参会人员的精准考证绝非单纯的史实罗列，而是深化会议研究的核心前提。从会议运行维度看，唯有明确参会人员的构成，才能系统还原会议议程的推进逻辑。从决策机制研究维度看，这一考证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成都会议的决策并非单向推动，而是参会者基于各自工作领域的实践反馈、现实需求共同讨论的结果。这一考证为理解这一时期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集体决策逻辑提供史料支撑。

关于成都会议的与会人员，既有研究存在显著差异：部分论著对此仅作简略提及，未予详述；另有部分论著则系统罗列了详细名单，提供了相对完整的信息。采用概括性表述的论著主要体现为：对与会人员的记载仅作整体性提及，未具体列出人员姓名，仅以“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地方负责人”等模糊范畴进行统括性描述，缺乏对人员构成细节的明确呈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二卷写道，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自治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11] 171}会议。又如，《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记述，与会者有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部分书记、候补书记，大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负责人^{[8] 150}。相较而言，中央领导人的年谱、传记等文献，通常会系统罗列参会人员的详细名单，为考订与会人员提供了基础线索。归纳一下，目前共有三种说法。

一是34人说。《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的记载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

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8] 150}。二是35人说。《毛泽东年谱》第六卷记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廖鲁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4] 310}。三是39人说。林蕴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写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王鹤寿、廖鲁言、滕代远、彭涛、林铁、刘仁、陶鲁笳、黄火青、欧阳钦、黄欧东、吴德、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张德生、张仲良、高峰、王恩茂、李大章^{[12] 27}。

然而，针对与会人员的考证，不能仅仅基于对既有三种说法的简单比对。因不同文献在记载时或详略不一，或存在偏差，使得这一问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鉴于此，笔者以202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的记载为切入点，对参会人员进行分类和有重点的考证。对比34人说和35人说，区别在于删去了彭真，增加了李先念和廖鲁言。新版《毛泽东年谱》第六卷进行了及时修订。再对比39人说，需要考证彭德怀、李锐、高峰、李大章的行踪。学界已有文章进行了初步研究，即《1958年成都会议与会人员考》。该文明确提出：汪锋“未参加成都会议，李先念、彭德怀、廖鲁言、吴冷西、李锐、高峰、李大章参加了会议”^{[13] 100}。对该文的考证，笔者基本赞同，不过要补充两点意见。其一，陈伯达、乌兰夫并非全程参会。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受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的讲话^[14]。这次会议于3月5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因此陈伯达并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初期讨论。3月15日，乌兰夫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参加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5]⁶⁴。因此，乌兰夫并没有参加成都会议后一阶段的议程。其二，李锐、李大章参会的准确身份应为列席会议代表。根据上文，此次与会者大多是中央、部委、省一级的领导人，而李锐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可见，这时李锐的正式职务还不足以作为成都会议的正式代表。李锐也在回忆中明确提到“关于三峡和长江流域规划问题，3月间开的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一个决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决定的起草。”^[10]¹⁶⁵⁻¹⁶⁶关于李大章，四川省原物资厅副厅长王吉祥回忆道，“成都会议期间，大章同志带我去参加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主题是如何使农村富起来的问题”^[16]²⁹⁹。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为切实做好会议场地筹备、后勤保障、协调地方资源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推进，其应是以列席身份参与了此次会议。作为四川省省长，他需随时向中央领导汇报地方情况，并为会议各项议程的开展提供必要支持。

简言之，成都会议的与会人员可分为正式代表与列席代表两类，总计39人。其中，正式代表37人，列席代表2人。既有研究关于与会人员的三种不同说法，分歧的根源在于统计口径的差异。部分论著可能未对正式代表与列席代表作出明确区分，或在统计时将特定人员排除在外，进而导致说法不一。通过明确统计范畴、细化人员分类，方能为厘清这一史实提供严谨的学术依据。

成都会议正式代表涵盖了多个领导层级。其中，包括毛泽东等9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等3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名中央书记处书记，1名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们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关键成员，在会议决策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从中央有关部委层面来观察，包括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6名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与会。涉及重要舆论阵地、工农业发展相关职能部门，对会议精神的解读、宣传以及相关工作的落实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领导层面，黄欧东等17名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参会。他们代表各地，基于地方具体情况参与会议讨论，为会议制定全国性的政策方针提供地方的实践经验。列席代表为李锐和李大章，其为会议召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从成都会议与会人员构成看，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央与地方联动的决策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央决策层主导，确定经济建设等重要议题；中央有关部门协同，协助中央决策层制定政策，确保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部署和有效执行；地方参与决策，既能使中央及时了解地方情况，又能及时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带回地方，迅速贯彻落实；秘书等工作人员辅助保障会议召开。

总之，成都会议通过这样的人员构成，搭建了中央与地方沟通协作的平台，既保证了中央对全国经济建设的统一领导，又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体现了当时中央与地方联动决策，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

三、成都会议的会议性质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17]根据工作需要，在中央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的主持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没有次数和时间的限制。另外，根据工作需要，有时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时期，根据实际的工作需求，中央以不定期的形式召开了诸多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由党中央召集，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地方领导人参会，围绕重大政策

展开讨论，酝酿作出重要决策，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供重要材料。

关于成都会议的性质存在“中央工作会议”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种表述。

一是中央工作会议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第二卷和《成都市志》等论著均持此说。二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坚持此说的包括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当代史》第四版、《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等。

此外，在中央领导人的年谱、传记记载中也出现了明显分歧。例如，《周恩来传（第二版）》第三卷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央层面党史国史研究部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国家级历史教材，还是省市级党史研究部门与地方志编纂机构，亦或是中央领导人的年谱传记等史料，对成都会议性质的界定存在显著分歧。这种跨多层级研究主体间的认知差异，反映出成都会议定性本身所涉及的史料复杂性与解读多元性，为进一步厘清成都会议的性质提出了需深入探究的学术命题。因此，对成都会议性质的界定，不能仅依赖于年谱、传记等文献的文本比对，而需回归历史本身，从会议的人员构成、决策效力及直接的史料证据等核心维度展开追本溯源的考辨。其一，成都会议的人员构成符合中央工作会议的特点。虽然成都会议与会人员包括9位中央政治局委员、3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但6位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17位省市区

党委第一书记与会，已突破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政治局成员为绝对主体的典型特征，形成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参会人员构成。换言之，由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共同与会、围绕经济建设主题展开讨论，比较符合中央工作会议的特点。其二，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符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策效力。成都会议围绕经济建设具体部署，提出和通过了多个文件。这些文件虽被纳入全国性的政策部署，但其本身并未产生效力。这些文件直至3月底4月初的数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正式审议批准后才获得生效执行的法定效力。比如，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成都会议提出的《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18] 580-581}这进一步印证了成都会议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性质——其成果更多体现为政策酝酿与草案形成，而非具备最终效力的决策文件。其三，成都会议是1958年上半年中央召开的系列工作会议之一。成都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19] 1244}。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20] 1750}因为杭州会议、南宁会议等均为中央工作会议，所以从会议序列与会议功能的连贯性来看，将成都会议称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较为不妥。其四，毛泽东的讲话记录可以作为成都会议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直接证据。1958年3月26日晚，毛泽东在作第六次讲话时指出，“这次会议的一些决议、意见，都是给政治局的建议”，“我们这次会议始终没有声明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文件还是要等中央政治局发”^{[4] 327}。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分析成都会议性质的直接证据，也是最关键的证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成都会议的性质应为中央工作会议。这一结论既立足于对会议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也契合该会议在1958年上半年中央系列工作会议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四、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

关于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数量，目前存在四种说法。一是30多份文件说。罗平汉、赵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二卷写道，“成都会议过程中，讨论并通过了30多份文件。”^{[11] 180}二是37个文件说。这是使用较多的一个表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记载：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等37个文件^{[2] 129}。《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周恩来传（第二版）》第三卷、《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第六卷、《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等均持这个说法。三是39个文件说。林蕴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写道，“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九个文件”^{[12] 33}。不过，该书并未列出全部文件的名称。裴棣的《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述评》也持此观点。四是40多个文件说。2010年出版的《毛泽东传》第四卷写道：“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20] 1768}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提到：“成都会议通过的40多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21] 479}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写道：“在成都会议上，党以很大的精力集中讨论经济问题，制定了40多个文件。”^{[22] 498}202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二卷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述^{[23] 490}。

上述差异的产生，既与文件保存的完整性有关，也与文件界定标准的不同相关。对成都会议相关文件的系统考证，既是厘清会议史实的基础工作，更是深入理解1958年上半年社会

主义建设进程的重要切入点。笔者通过对比多种史料，采用分类梳理与逐项核验相结合的方法考辨相关文件，最终确认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总数为44个。从文件数量维度考量，成都会议形成的文件规模已超过此前召开的南宁会议与杭州会议，体现出此次会议在政策酝酿层面的广度与深度；就文件内容而言，这些文件可分为四大类，分别聚焦工业和其他经济问题、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体制和管理权限问题，以及中央相关通知和国防问题。

（一）工业和其他经济问题

成都会议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问题方面，制定了13个文件，即《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一九五八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第二本账的简要报告》《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调剂和补充职工问题的意见》《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关于在生产高潮中应当控制劳动强度的通知》《关于铁路规划问题的意见》《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和改变工业品出厂作价办法问题的意见》《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的报告》《关于工业产值计算问题的意见》《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

这些文件既反映了当时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激活地方活力的积极尝试，也为初步形成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工业化格局作出了贡献，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为后续工业政策提供了经验参照，更在于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参考。

（二）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

成都会议在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上，制定了4个文件，即《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

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改造农村落后居住条件的指示》。这些文件围绕生产组织优化、农民利益平衡、农业现代化推进、居住条件改善等议题展开，推动了农业集体化进程与农村的发展，初步平衡了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为规模化农业生产提供了组织基础。

（三）体制和管理权限问题

成都会议在体制和管理权限问题方面，制定了17个文件，即《关于财政下放、工业下放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收入项目和分成比例改为基本上固定五年不变的通知》《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关于税收体制和粮食体制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粮食部党组关于改进粮食体制和1958—1959年度粮食收支计划的初步意见向中央的报告》《关于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1958—59年度粮食收支计划（草案）》《关于在河北、广东、北京、上海进行试点，研究进一步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意见》《关于物价管理权限和有关商业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的意见》《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的几项规定》《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各省、自治区和专区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队伍的意见》《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

上述文件体现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宏观改革取向，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弹性调整，激活地方发展动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系统性向地方放权，打破了“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惯性，为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中央相关通知和国防问题

成都会议还制定了中央相关通知，以及有关国防问题的10个文件，即《关于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关于粮食供应工作的通知》《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

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关于彭涛报告的批示》《关于王鹤寿两个报告的批示》《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关于国防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这些文件在思想、政治、国防动员等层面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凝聚共识，推动了重大工程的起步。比如，《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24] 280-281}。这都为后续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及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上述各类文件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共同推进了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其中，聚焦工业和其他经济问题、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的文件，围绕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核心议题，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载体；而围绕体制和管理权限问题，以及中央相关通知和国防问题的文件，则从制度保障、资源调配等维度形成支撑，为工农业发展筑牢基础。这些文件均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核心要旨，集中体现了党领导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愿望与实践热情。

不过，成都会议形成的相关文件亦存在历史局限性，这与1958年中国所处的复杂国内外形势紧密关联。这些国内外因素相交织，共同塑造了成都会议诸多文件的制定背景与政策导向。成都会议通过的系列文件，既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以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为后续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这些经验成为党领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结语

成都会议是195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本文通过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的系统考察，得出如下结论：成都会议作为中央工作会议，于3月9日至26日召开，与会人员共计39人，制定了44个文件。这些考辨澄清了成都会议的核心史实。

从成都会议文件的制定、生效过程观察，可总结这一历史时期中央决策的运作机制：中央工作会议侧重于集思广益、形成政策草案与工作思路，为后续决策提供基础；而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会议，承担着对重要政策的最终审定与批准职能，二者在中央决策机制中形成了由酝酿到最终决断的关系。

成都会议作为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重要节点，严谨细致考证其会议性质、文件数量等模糊表述，不仅为准确把握成都会议在党史会议序列中的地位提供坚实依据，而且可以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借史料记载的碎片化制造的历史认知混乱。在党史研究领域，对成都会议相关史实进行系统考证，绝非单纯的史料梳理工作，而是彰显党史研究科学性的关键环节，对实现党史叙事的正本清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注释：

- ①裴棣：《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李亮：《1958年成都会议与会人员考》，《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

4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参考文献：

- [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四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2]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 [3]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增订版）：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4]毛泽东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6]邓小平年谱：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7]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 [9]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 [1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 [11]罗平汉，赵鹏.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 [12]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 [13]李亮.1958年成都会议与会人员考[J].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4).
- [14]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N].人民日报，1958-03-11.
-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第9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16]李亚丹，等.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 [17]中国共产党章程[N].人民日报，1956-09-27.
- [18]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9]周恩来传：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20]毛泽东传：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21]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第 2 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1949.10—1966.5): 第 27 卷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4] 中央档案馆, 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责任编辑 赵春】

An Examination on Certain Historical Facts about the Chengdu Conference

ZHANG Changl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In March 1958,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nvened an important meeting in Chengdu. However, controversies over some core historical facts around the meeting remain amid the academic circles, including specifics on its convening dates, nature, attendees, and documents. A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co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from March 9 to 26, lasting 18 days; second, it was a Central Working Conference rather than an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ird, the attendees included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and non-voting representatives, totaling 39 people, instead of 34 or 35 as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 fourth,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adopted at the conference was 44, rather than the vague expression of over 30 or 40. The rigorous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about the conference not only help consolidate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narratives, correct the mistakes and restore the truth, but also provide a necessar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entral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Key Words: Chengdu Conference; Central Work Conference;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上接第118页)

Practical Exploration, Problems, and Pathways for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among Group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n the New Era

WANG Jinzhu, LIU Zhenxin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Haidian,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Party building among group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arty building at community level.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focusing on key issues such as “who is responsible”, “how to build” and “how to play an effective role” concerning Party building among group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has promoted the top-level design for it, strengthened Party leadership over it, strengthened its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activated th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and improved the institutions and standards for Party building among the groups.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arty building, such as incomplete organizational coverage, scattered and in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weak role performanc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t is advisable to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ake organizational coverage as the foundation to build an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at extends to all sectors and levels; take enhancing leadership capacity as the core to improve the Party building pattern of joint linkage and joint management; tak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s the key to promot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ith business operation,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and services for the groups.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group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problems; pathway